生态危机的经济学思考

武 杰,康永征

(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系,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 人类未来的冲突决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冲突,还可能发展到为争夺生态空间而大动干戈。如果说恐怖主义、霸权主义不会在短期内消失的话,那么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将会困扰人类更长时间。为了能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缓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文章将视角转向经济领域。首先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三个层面深入分析了生态危机的内在本质;接着进一步从经济学与生态学的角度阐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异化及其表现形式;最后提出了解决生态问题,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基础、根本方式和社会保证,试图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一种科学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 生态危机;市场经济;主体异化;发展思路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4)06 - 0010 - 06

20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并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 1900 年相比,20 世纪末的全球人口增长了 5 倍,经济产值增长了 20 多倍。但随着人类干预大自然能力和规模的增长和扩大,在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自身也陷入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困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未来的冲突决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冲突,还可能发展到为争夺生态空间而大动干戈。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哲学家预言,恐怖主义、霸权主义虽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敌人。困扰当今世界的三大“过剩”问题——人口过剩、技术过剩、消费过剩,都是从生态危机角度提出来的。仔细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命题,因为这两个语词的本来意义是很难区分的。它们都起源于希腊文 Oikos,其意义是家务(household)。生态学是家务的逻各斯(Logos),经济学则是家务的规则(Nomos)。Logos 可以翻译为理性(reason),Nomos 则可以翻译为规律(law),它们的内涵是重叠的。^[1]然而,经济学现在的意指和生态学的意指却是很不一致的。

本文将首先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三个层面深入分析生态危机的内在本质,接着进一步从经济学与生态学的角度阐述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异化及其表现形式,最后提出解决生态

问题,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基础、根本方式和社会保证,试图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一种科学的发展思路。

一 生态危机的内在本质

今天,当我们谈到生态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生态圈,主要是指自然环境。当我们谈到经济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人的生产、交换、消费和服务。如此对待这两个论题,它们便很难相互衔接,这正是问题之所在。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我们也需要生产、交换、消费和服务,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但正是因为两者我们都需要,当我们专注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時候,便可能会有某种灾难发生。事实上,这种灾难已经降临。

1. 生态危机是人类活动所引起的一种自然生态的失衡

有史以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直接环境就是由许多生态系统构成的,我们把它称为生态环境。这里的生态系统,一般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物理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功能系统。按照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A. G. Tansly)的看法,“这个系统不仅包括有机复合体,而且也包括形成环境的整个物理因素复合体。因此,生态系统可定义为在任何规模的时空单位内由物理——化学生物学活动所组成的一个系统。”^[2]

【收稿日期】 2004 - 03 - 15

【作者简介】 武 杰(1950 -),男,山西太原人,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
康永征(1979 -),男,山西文水人,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系,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这个系统可分解成四个基本组成部分:无机环境(如空气、水、矿物质、土壤、阳光和气候等)、生物生产者(如绿色植物和进行自养生活的低等菌类等)、生物消费者(如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等)、生物的分解者(如微生物)。它们共同发挥作用并形成一有机整体。一定规模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它吸收太阳能并经光合作用而转化为有机物,同时又通过蒸发、呼吸、微生物分解等多种渠道向外界输出物质和能量。这种以生物群落为核心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就是生态系统最基本的功能和特征。生态系统中还存在着复杂的反馈机制,这种机制可以使系统稳定在一定的状态下,这种状态被称为自然平衡。

所谓生态危机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灾害问题,而是指由于人的活动所引起的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秩序紊乱、生命维持系统瓦解,从而危害人的利益、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自然发展史上具有一种不可逆转的倒退性质。但是,它不是自然界自发产生的,而是由人类的实践活动所引起的,是人类活动的一种负面效应的累积。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J. D. Bernal)指出:人类从作为一个猎人或农夫开始,就“从事推翻自然界的平衡以利自己”的活动。^[3]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耕种农田、开山采矿、建造水库、发展交通运输、建设工厂,变荒漠为绿洲、变荒山为果园、变沙滩为城镇,所有这些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为人类的未来创造了美好的前景。然而,人们的实践活动还有另一面。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是人类向自然索取的积极成果,但是它的消极面却是对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正是由于实践活动的这种双重效应,人类在历史上屡遭危机。在渔猎文明时期,原始人类由于过度采集和狩猎消灭了大量物种,曾导致食物危机和区域性的生态危机,不得不迁离旧区域或发明新技术来渡过这种危机。进入农业文明以后,发生了食物生产方面的革命,改变了整个人类生存的物质状况和社会状况,但是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又导致了土壤流失和沙漠化等土地危机。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片面追求产值的经济发展既破坏了宝贵的自然资源,又向环境倾注了大量有毒有害的污染物。人类创造的成千上万种化学合成物质破坏了在漫长地质年代所建立的物质平衡与循环。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和规模庞大的“征服自然”活动,导致了环境恶化、生态破坏、气候异常、臭氧层损耗、生物多样性锐减、资源匮乏、疾病蔓延……人类正面临着空前险恶的生态劫难。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M. Heidegger)所说,技术把人带入无保护状态,使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技术引导人们去征服大地,而征服大地不过是无限掠夺的第一步,是人与自然关系错置的开始。^[4]我们知道,作为自我调节系统的自然界本身具有强大的自净能力、再生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然而,现代人一味地利用地球,强迫它超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从而严重影响着生态系统的自稳定和自发展,使整个自然生态面临着发生不可逆转的大倒退甚至大毁灭的危险。反过来,它又严重影响和威胁着人类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危机,恩格斯把它说成是“自然界对我们人类的报复”。

2. 生态危机是两种生产和两种生产力之间矛盾尖锐化的表现

众所周知,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根本标志。然而,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力要实际地发挥作用,又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物质条件,即任何具体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力都要以一定的自然生产和自然生产力为基础。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是社会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统一过程。一方面,自然界是社会生产须臾不可缺少的材料,它既是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也构成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5]另一方面,自然生产和自然生产力构成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力的基础。特别在农业、采矿业、捕鱼业、伐木业等产业部门,人们所直接面对的不仅是“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土地、矿藏、森林、鱼类都是如此,而且“在农业中(采矿业中也一样),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6]“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后者的显而易见的条件,会阐明前者的条件,并且会排除只是由流通幻影引起的思想混乱。”^[7]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明确指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8]

可见,社会生产与自然生产、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人们只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注意自然生产的发展和自然生产力的补偿,那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动摇社会生产的基础。长期以来,人们一味向大自然索取,急功近利地发展社会生产,追求眼前利益,同时也无节制地向自然界倾弃各种废物,完全不顾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和承受极限,导致了自然生产的破坏和自然生产力的锐减。结果,社会生产的材料和能源需求与自然生产的物质供给之间出现了剪刀差,形成尖锐对立,同时,自然生产力的破坏反过来又严重抑制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所谓生态危机其实就是上述两种生产和两种生产力之间矛盾尖锐化的表现。

3. 生态危机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的生存危机

生态危机从其产生的根源上来看,是人类活动所引起的;从其性质上来看,它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对人类的威胁都是严重的;但从本质上来讲,真正危机的并不在生态本身,不在自然方面,而在于人类本身,在于人的方面。这是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只有人才是真正的主体。自然曾经是而且仍然是盲目地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它的任何变化和全部适应性都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过程。它的兴旺、它的毁灭、它的某种形式的存在与否是它自己所意识不到的。也就是说,生态危机的发生与否对自然而言并无本质的区别,但对于人类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9]生态危机从表面上来看,是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衡、资源的匮乏、生物多样性的锐减……,而在实质上却是人类从事生产的基础和生活在其中的环境的破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遭遇困难、

面临灾难。人类数千年劳动创造的美好生活、全部文明和光明前途因此行将结束、面临毁灭……。所以说,生态危机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的生存危机。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类社会也就无所谓危机不危机了。

生态危机作为人类的危机,其实是人类主体地位的危机。我们知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并且这种主客体关系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自然发生的,它在本质上是人通过社会实践——劳动而逐渐确立的。人通过实践活动同自然界发生联系,并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变革自然,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资料,满足自己的社会性需要。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动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造就和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同样,在实践活动中,自然界的事物成为人们实践的对象,从而成为客体,获得了客体的规定性。然而,人类活动的负面效应的累积——生态危机——通过自然生产和自然生产力的破坏,反过来影响和破坏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力,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剥夺和取消人类业已取得的主体地位。因此,真正的危机并不在于生态的失衡和毁灭,而在于人类主体地位的削弱、否定和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危机不仅意味着自然生态的退化,而且意味着人类自身的退化。生态危机作为人类活动的负面效应的累积,它在本质上是人类活动的片面性所造成的。正是这种片面性的存在、膨胀和累积不断地侵蚀和否定着人类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且在现代已经达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人类主体能动性发生了异化。

二 当今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生态危机作为人类活动的负面效应的累积,在今天已达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没有一个思考生态问题的人会否认其严峻性,“但我们却根本没有去适应它”,破坏和污染环境的活动仍普遍存在,^[10]学术界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也愈演愈烈。这就表明,解决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而更多的则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客观地讲,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异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1. 主体能动性的异化

人之所以能以自己特殊的影响加之于自然界并进一步导致生态危机,其基本前提是人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不同于自然因果性的意志自由,也称人的主体能动性。正因为人有意志的自由,它才能跳出自然因果性的链条,在必然性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意志和创造。同时,也只是因为有自由意志及其创造性,人才可能在必然的因果性之外对自然环境施加自己的影响,切断自然必然性的链条;反之,没有这个前提,人就不能对自然环境施加自己属人的影响,更不能引起伦理学意义上的生态失衡与环境危机。那么,自由意志及其创造性的充分或极度发挥就成了生态危机的原因了吗?

事实上,自由意志的活动却总是同“人是目的”这一伦理学的理念相一致的。^[11]同时我们也已论及生态危机之所以成了“危机”,也只是相对于人类的生存这个标准而言的。由于

生态危机实际上是人类的生存危机,所以它决不是“人是目的”这一伦理理念的表现。因而,这里的情况也很清楚,就其本质而言,自由意志的充分发挥导致的只能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实际上,这一命题已经包含了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的生态环境,那么,“不适应”的环境又是怎样生成的呢?

如上所述,既然生态危机的产生必然以自由意志的存在为基本前提,而意志自由本身又不可能直接导致这种危机,那么,结论就只能是这样:人的自由意志创造了某种生存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中,人重新被沦为一种不自由的动物——成为某一过程运行的工具而不再同时是目的,即人处于一种“异化”状态之中。所谓人的异化,就是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而被置于自己对立面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而言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抗状态。由于在异化状态中,人的“自由意志”的发挥已不再是“以人为目的”,而成了某种外在过程实现的工具,所以,当“自由意志”的发挥把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抗推向了极端,这就导致了生态危机——它同时也是人类的生存危机。

2. 主体能动性异化的表现形式

18世纪启蒙主义带来的理性精神并未使人类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相反却使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野蛮状态。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正是理性化统治对现代人的异化,科学变成了新的神话,“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人们以他们与行使权利的对象而异化,换来了自己权利的增大。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像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独裁者只是在能操纵人们时才知道人们;科学家只是在能改造事物时才知道事物。”^[12]所以,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已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由意志”的发挥把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抗推向了极端。

首先,从价值观念上来看,推崇财产私有,主张索取和占有,片面强调自然对人的有用性,使自然服从于不断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以“物”的发展作为衡量人与自然统一的尺度,这是主体能动性异化的特征之一。价值观念上的这种定向和共识,决定了任意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发自然的类型只能是掠夺式的和浪费性的。它把自然仅仅看作是原材料、资料 and 为满足增加已有价值的需要而存在的东西,完全无视自然的价值和地位,无视自然的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结果,一方面是有限的扩张和索取,另一方面却是有限的能力和资源。于是,资源耗竭了,而生产和生活垃圾却不断地堆积起来……。这样,水到而渠成的正是人类文明的奇观——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到头来,资本主义“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13]

其次,从生产方式上来看,现代社会受功利性世界观和物欲至上价值观的驱使,片面发展社会生产,单纯追求最大利益,这是主体能动性异化的又一特征。传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质上正是这样一种服从于资本冲动和金钱欲望的

异化了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与经济活动方式中,人已沦为经济运动的工具而不再同时是目的本身了。正是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人丧失了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性沦为非理性的经济运动的一种“活动力”。这势必导致两个并存:一是掠夺自然与剥削他人并存,二是滥用主体性和践踏主体性并存。一方面,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资本不惜血本发展和利用科学技术,不断地提高掠夺、征服和开发自然的能力。结果,在自然生态进化的历史中,只破坏不建设、只索取不补偿、只污染不治理,只是滥用人的主体能动性,凭借强大的科技力量肆意征服自然和掠夺自然。另一方面,资本利用科学技术在普遍地占有自然的同时,却使在这一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异化、劳动及其结果异化,造成了人对自然的占有在社会意义上的分离。结果,掠夺自然是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而实现的,滥用人的主体性的活动又践踏了人的主体性。这样,人剥削人就成了人掠夺自然的社会表现,而践踏主体性就成了滥用主体性的自然结果。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博尔丁(K. E. Boulding)宣称,现代资本主义已开始不剥削人,而只剥削一个自然界。他说,科学技术革命“使得经营自然界十分有利,以致剥削人成为过时的事情”^[14]。英国学者帕·查·斯诺(P. C. Snow)在1959年所作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演讲中,批评了一些人过分渲染过去田园牧歌的悠闲而扩大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某些现代社会弊端的做法,认为健康、食物、教育,除了工业革命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这些东西成功地传播给许多贫穷的人。^[15]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代资本主义并未消灭剥削,它正在制造新的依附和贫穷。

再次,从意识形态上来看,霸权、强权、奢侈、贫穷等是私有制度的必然产物,这也是主体能动性异化的一个特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势必产生如下结果:一是霸权、强权不仅反映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而且日益突出和广泛地渗透并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发达国家为强化高科技行业的垄断地位,保持贸易、金融、管理、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把污染严重、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污染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发展中国家不仅在资源生产与经济增长方面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而且还将成为主要的污染承纳国。发达国家一方面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另一方面却通过质量认证、绿色标准、产品配额等措施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其国内市场。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和贫富悬殊进一步加大。据资料表明,占世界人口4.6%的美国就消耗掉世界25%的能源。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第三世界就不可能过上稍微像样的生活”。^[16]二是霸权、强权同时导致贫穷和奢侈并存,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发达国家运用自己手中的财富和权力,一方面无限地追求物质享受,过着极端富裕和奢侈的所谓高消费生活,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债主;另一方面,陷入债务危机中的不发达国家,不仅过着极端贫穷的生活,而且为了生存被迫把自己的自然资源廉价出售给发达国家,对外国债主履行还债义务。同时,发展中国家以掠夺资源为特征的开发是一种浪费性的生产。这种生产只把极小一部分

(不到10%)资源转化为产品,而把绝大部分资源(大于90%)以废物的形式排放。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对此,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指出,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所造成的“贫穷是全球问题的主要原因和结果”。“这种不平等是地球上的主要‘环境问题’;它也是主要的‘发展问题’。因此,解决发展中国家贫穷和环境退化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成为一个社会革命的政治问题。”

三 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思路

从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 H. Haeckel)提出生态学的概念到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深层生态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与人文科学世界观的结合,随之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等学科应运而生,形成了当代的“绿色”理论与批评。这些理论都企图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机械论世界观,提出系统整体性的生态世界观;重新思考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与责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自然—社会”的协调统一;批判自然无价值的理论,提出自然具有独立价值的观点,强调人与万物的平等;同时,提出环境权问题和可持续生存道德原则,强调科技的人文文化。可以说,生态批评的兴起正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以至一些现代性观念,从理性、主体性到自由、民主、发展……现代性方案等再次面临全面的修葺。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和探索中不难看出,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效地解决生态问题,保证人类社会长住久安和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和突破人类社会以往所具有的种种局限性。

第一、人类必须改变以往所形成的狭隘的自然观,建立一种全新的“大自然观”。这种大自然观采用一种系统整体的方法解释自然和评价自然,并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作用。生态学揭示的“自然”是一个完美、稳定、和谐的生态共同体,一个进化发展的生态系统,一切价值的源泉。价值产生于自然界中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合作和相互竞争之中,内在价值(生命)、工具价值通过生态系统的连接机制整合于最高价值,即生态系统的系统价值。这种最高价值的表现之一就是创造出人这种最高内在价值。具体来说,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或物种都只是更大进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产物和工具。大自然的进化事实表明,生态系统通过竞争、协调,加上个体的自然选择来选择适应的性能,选择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促进物种的分化,淘汰不适应的物种,以完美的资源能量、运转模式支持越来越多的物种。在系统底部的无机物和植物的工具价值的基础上,产生出越来越有主体性的物种直至人类。每一个体的生和死都融入系统的价值之流,这就是生态系统的运转和进化途径。在大自然的进化中,人类以其出类拔萃的思维、语言和形而上学能力区别于其他动物,并存在于一个开放的整体世界中。人类的这种进化优越性值得自豪,同时也赋予他关怀其他事物的责任。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认为,“生态系统既是一个生物系统,也是一个人类处于其顶端的系统。”^[17]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自己生存环境的关系,毁坏自然就是毁坏自己的家园,毁坏自己的“社会的房子”。^[18]原因在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也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9]。甚至“可以说,世界若不包含于我们之中,我们便不完整;同样,我们若不包含于世界,世界也是不完整的。”^[20]所以,要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态—自然”的复杂系统,社会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而且首先包括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态。这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解决生态问题的认识基础。

第二、人类必须改变以往所形成的狭隘的生产方式,丰富、扩大和深化社会生产的内容、范围和层次,建立一种全新的“大生产观”。生产活动历来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作为人类打破自然平衡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自然物质形态发生变化,提高它们的结构有序性和功能有序性,使高熵无序的自然物(原料)改变成低熵有序的人造物(产品),从而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在这里,人类活动以负熵的形式投入到生产过程,提高了事物的有序性,这就是人类劳动创造财富、创造价值的过程,即所谓的生产活动的正效应。另一方面,生产又是以打破自然平衡和消费自然为条件的,同时就必然地伴随有废物的排泄。在这里,打破自然平衡、消费自然和排泄废物又是生产活动赖以进行的必要环节,它们又以熵增的方式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增加了自然界的熵值。这又是生产活动破坏生态、消耗资源和影响环境的方面,即生产活动的负效应。所以说,生产活动既是一个熵减过程,也是一个熵增过程,这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必然性所在。

生产活动自从有了人类便一天不停地进行着,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深化。这样,它的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也随之增长。重要的是,人类的社会生产一经产生,它就以自然生产无法比拟的速度和规模迅速发展,这是人类社会蒸蒸日上的深刻原因。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的负效应也迅速增大。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实践作为一支强大的生态力量和地质力量曾经改变了地球的表面和地貌。今天,它又以一种更强大的因素——天文力量——而开始发挥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大规模地开发自然、改造自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同时也使生产活动的负效应与日俱增,使其达到了全球性的程度。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实现社会生产与自然生产、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有机结合,建立一个将两种生产和两种生产力协调统一的大生产观。这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式。

第三,人类不仅需要改变原有的认识,改变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且必须改变与这些思想认识和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整个社会制度,建立一种全新的“大社会观”。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有99.25%的时间我们生活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最近100年的

时间里人类就变成了地球的致命寄生虫。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并非单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术”。现代技术中隐藏着的力量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彻底改变。由于技术意志,一切东西都成了生产的物质,地球与环境亦变成了单纯的原料,甚至人也是最重要的资源。所以海德格尔预言,我们总有一天会建立许多工厂来人工生产人力资源,有计划地生产出男人和女人。今天的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已经离此预言不远了。^[21]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时至今日人类还将GDP或GNP(这里指的是非健康经济)等增长的速度定义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量化指标。原因在于:(1)人类是否还不明白生存的真正意义,扭曲的价值观使人类社会以为有钱就有一切。(2)由于某种经济上的原因,使人类社会自毁的加速度增加了。例如,我们达到能向空间发射信号的技术水平,至今不过几十年,可是几乎同时,人类就造出了只要一次打击就足以灭绝全球一切生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3)人类用自以为是的科学技术来发展军事,目的在于杀人。例如,目前人类90%的基于科技之上的发明创造首先是用于军事,用于消灭人本身,而不是别的。……从哲学上讲,人类发展并不完全依赖经济的增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可怕的“发展”呢?道理很简单——是由人类极端的自我、绝对的“我性”造成的!^[22]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统治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而且也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秩序,也就是说技术破坏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生态。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技术手段基础上的“合理化”官僚社会。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本身包含着一种支配的合理性。即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进步带来的享受与安逸掩盖了技术与统治、合理性与压迫的融合关系,也就是说,现代科技并没有消灭贫穷,甚至在制造新的依附与贫穷。我们以一个现代化饲养厂为例,养鸡所投入的精饲料(主要是人的食物,如小麦、玉米等)与纯产出(鸡肉)之比是20/1;要生产1公斤牛肉,需花费190m²土地的农产品和10万5千公升的水,而生产1公斤大豆只要16m²土地和9千公升的水。就是说富人每享受1公斤牛肉所需的土地,就可以为穷人生产近12公斤的大豆或8.6公斤的玉米。^[2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饥饿与浪费、依附与贫穷的内在联系,生态危机也意味着社会正义的危机。

因此,一些生态主义者把生态问题看作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可以照出现代工业文明的病态。它映现出目前流行于全球的市场竞争机制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因为这种竞争机制并不计算生态成本和环境成本。于是,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就会最大限度地消费资源和环境,因而,也就不能避免“公有地悲剧”的产生。要改变这种状态,实现社会公正,就必须建立一种适合于人类整体利益的社会化的联合体和社会制度,使“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4]这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保证。

综上所述,人类不可能脱离其环境而获得自由,而只能在环境中获得自由。因此,人类应当全面地考虑问题,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人性的提升。只有当人培养出“真正的利他主义精神”时,人的自我完善才能实现,才能更好地使用其独特的能力,在地球上“既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公民’又作为其‘国王’……对生态系统进行治理。”^[25]为此,我们就不能放任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非理性冲动,而必须为它安装一个“理性的脑”,使资本的冲动服从理性的指引,从而成为以人为目的的市场经济。目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许能找到一条走出经济学与生态学相互碰撞而产生的两难困境之路。正如恩格斯所说,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但是要实现这种调节,单是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26]目前中国推行和实施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美国著名环境学家哈瑞斯(W. M. Harris)认为,“如果在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那么世界上就不应当有任何一个国家说它不能。”原因是中国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20%以上的大国,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更集中地体现在“相对低的环境代价生存”意识场上,或者说体现在精神境界上而不是物质刺激上。^[27]美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B.科布(J. B. Cobb)还预言,“中国甚至能引领整个世界的道路”。^[28]

【参 考 文 献】

[1][28]小约翰·B.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J].新华文摘,2002(11):164、167.
 [2]转引自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83.
 [3]J. D.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3.535.
 [4][21][23]张兴成.现代性、技术统治与生态政治[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B2科学技术哲学,2003(11):34、35、35~36.
 [5][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2、95.
 [6][2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64、926~927.
 [7]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9.
 [8][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8、519.
 [9]巨乃岐.试论生态危机的实质和根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7(6):21.
 [10][18]汉斯·萨克森.生态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2、4.
 [11]康德.康德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108.
 [12]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8.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48.
 [14]K. 博尔丁.20世纪的意义[M].伦敦:1965.113.
 [15]P. C. 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8.
 [16]杰里米·里夫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70.
 [17]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9.
 [20]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86.
 [22][27]转引自叶岱夫.最低环境代价生存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4):80、82.
 [25]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11.

(责任编辑 魏屹东)